

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的 温馨岁月

◎ 文/卢荣艳



•1922年，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寓所前合影

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，上海因其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影响力，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势力风云际会的战略要地。上海对于革命领袖孙中山来说更是如此，况且这里是他的夫人宋庆龄的出生地，对孙中山来说更具有不一般的意义。孙中山从青年时代为上书李鸿章在上海中转，至他接受冯玉祥邀请北上最后一次途经上海，他曾经多次来到上海，或临时落脚，或联络同仁，或为革命筹款，最后定居上海。上海对孙中山来说，没有在广州那般惊心动魄，却成为他风尘奔波中一个可靠的港湾。

四位华侨 赠送花园洋房

一开始，孙中山在上海并没有固定的居所。辛亥革命胜利后，孙中山结束流亡生活，于1911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天来到上海，住在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，即宝昌路408号（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）；在南京卸任临时大总统后，孙中山于1912年4月来到上海，住在老朋友宋耀如宝昌路491号的家中，一住就是一年多。孙中山和

宋庆龄在日本结婚后，于1916年5月1日回到上海，两人租房居住在环龙路63号（今南昌路59号）。后来他是如何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宅的呢？

据孙中山的侍从副官马湘回忆，有一天，有四位华侨来环龙路拜访孙中山，出门时恰巧碰到马湘，他们问马湘：孙中山先生住的房子太不像样了，是他自己的吗？马湘回答：不是他自己的，他哪里有房子？这房子每月要付65元租金。四位华侨听了后感慨万千，说：“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，哪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连住的房子也没有呢？我们一定要替他想办法。”原来，这四位归国华侨准备在上海开一家化妆品工厂，他们看到孙中山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，便召开股东会议，决定拿出一笔钱购买一所像样的房子送给孙中山。后来，他们购买了位于环龙路不远的莫利爱路29号（今香山路7号）的花园洋房。当他们再次来拜访孙中山，说明来意后，孙中山说：“送房子给我吗？不可！不可！我怎能接受你们这样重的礼？”最终，孙中山经不住华侨们的多次劝说，才接受了这幢住宅。

孙中山于1918年6月26日回到上海后，便搬进了这幢房子居住。一周后，孙中山给儿子孙科写了一封信，告知自己的近况：

……忽患眼疾，遂往西京大学就医。据医生云：系结膜炎，十日内外可痊愈。同时得孙夫人由上海来电云：已与法国领事交涉好，上海可以居住。遂于六月廿三日由神户乘船，廿六日抵上海，平安登陆。现住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。眼疾至今始完全好清，现在身体健康如初，切勿为念也。

对于现在之时局，拟暂不过问。广东已派代表到沪，劝就政务总裁之职，但此事父并无成见，已付之同志

多数之意见裁决施行而已，如果必要就职，亦不过派人代表，父决不能再来与此辈为伍也。儿以后宜着媳妇与两孙回来，在港澳地方居住，以待时局之变，父想不日必可于吾党有好机会也。若时机适宜，父当回乡一住，以遂多年之愿。

宋子文之住址如下：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四九一号。彼与孙夫人二人，儿当致函，以吊唁其父可也。

父示 七月四日

在信中，孙中山告诉儿子孙科自己在上海的新住所以及健康状况，还透露了此次来上海居住，“暂不过问”时局，并叮嘱儿子给宋子文致函，吊唁刚去世的岳父宋耀如。而这段“暂不过问”政局的时光，也给孙中山带来了一段温馨的家庭生活。

杭州游玩 拒绝警察保护

在上海孙中山故居内，保存有不少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此生活时用过的物件。比如他们曾经使用过的一台留声机，一副门球棍和门球，孙中山使用过的砚台、印泥、放大镜，孙中山亲自绘制的《中国铁路全图》，宋庆龄使用过的一台打字机，他们从日本带回来的瓷器餐具，还有布满了书房客厅的中外书籍等。这些历经劫难的旧物如今被安置于原处，默默无声，却将我们引向了他们在此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温馨岁月。孙中山的菲律宾朋友曾经这样描述这幢住宅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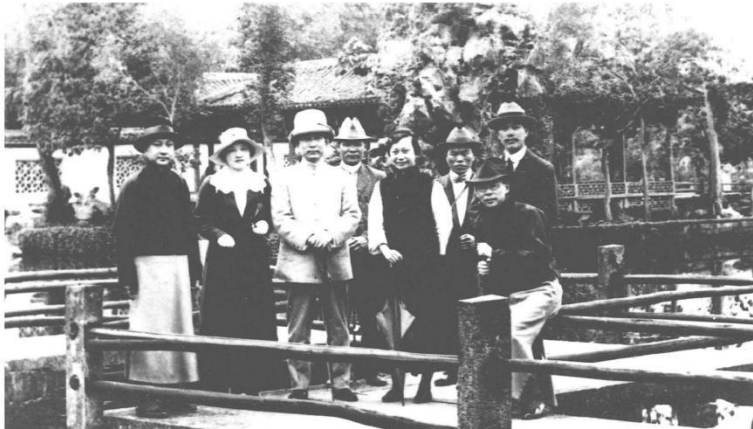
“孙博士沪上法租界之宅，全是西式，以石建筑之二层楼小房。……家中陈设半为中式，惟出于孙夫人之美术布置，颇觉中西折衷，幽美可观。客厅中置一钢琴，盖示其家主妇之雅好音乐也。孙夫人……能操英语，尤较其夫为纯熟。”



•1917年春，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寓所

孙中山患有肝病，却常被认为是胃病。他的日本友人曾经介绍日本医生来华为他诊治，建议他多吃一些不易消化的食品，以增加肠胃功能，刺激肠胃的消化。因此，孙中山常常吃一些粗硬的食物，而且喜欢吃咸蛋。在上海期间，孙中山在宋庆龄的照顾下，身体有了明显的改善。此外，孙中山还喜欢在家中的花园里运动。曾担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回忆，每日闲暇时，孙中山常常在宋庆龄的陪伴下在花园草坪上玩槌球（croquet）。另外，象棋也是孙中山一大业余爱好。他常常与友人或同僚“相约而弈，至深夜乃辍，日以为常，亦不见疲倦”。在他的行李箱中，除了书籍，即是象棋和棋盘了。在莫利爱路寓所的客厅中，曾经也陈设着一副象棋。当年，新加坡晚晴园主人张永福来上海期间，常常来孙中山寓所陪他下象棋，“越日又约与弈，至余离沪乃至。”

此外，他还喜欢游山，每到一



•1919年4月，孙中山与宋庆龄等在杭州西湖合影。
左起：李谋之、宋庆龄、孙中山、黄惠龙、黄大伟夫人、马湘、陈少白、黄大伟

地，便约三五同志登山游览，一为运动，二来考察当地险要地形。1919年4月，孙中山在宋庆龄等人的陪伴下从上海到杭州游玩，并在西湖边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

然而这次出行，还发生了一件小事。那天，孙中山与宋庆龄在陈少白、李谋之和黄大伟夫妇的陪同下，由马湘与黄惠龙跟随护卫来到杭州。孙中山头戴白草帽，身穿白色长衫，拿着手杖，为了不引人注意，他还特地带上了一副墨镜。到杭州下车时，他们身后却有三个警察跟随着。等到了李谋之的别墅“李庄”时，两个警察跟了过来。马湘便问他们有什么事情，一位警察说：“我们是来保护贵人的，我们已有一个警士返区署报告了。”马湘便进去告诉孙中山说：“有两个警察从车站跟着我们来到这里，说是要来保护贵人的。”孙中山听后生气地说：“蠢仔！有什么‘贵人’？”他走到门前对警察说：“警

察职务是维持地方治安，我是一个平民，为何要跟来保护？快回去执行你们的公务吧！”正在此时，杭州警察厅厅长率领10名警察赶来，孙中山便对这位警察厅长说，你不要告诉别人，叫他们赶快回去。这件事说明警察对孙中山非常尊敬，主动前来保护，同时也体现了孙中山反对封建官僚那种趾高气扬、讲究排场的恶习。

书店买书 借钱雇车运回

孙中山曾经说过：“我亦读书破万卷也。”“余一生爱好，除革命外，唯有读书而已。余一日不读书，即不能生活。”宋庆龄常常在晚上陪他读书、写作，直到深夜，有时还为他朗读。宋庆龄后来回忆说：“我的丈夫有许多书，他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。每晚他最喜爱的事，是铺开巨幅中国山水、运河图，弯腰勾出渠道、港口、铁路等等……我给他读马克思、恩格斯，还有著名科学家

如汉道科·埃利斯、危普顿·辛克莱等写的书。”此外，孙中山常常将好书赠送给宋庆龄、儿子孙科以及其他革命同仁。1920年4月12日，孙中山赠送给宋庆龄《中国的发展》一书，并在扉页上用英文写道：“赠给我的妻子宋庆龄 孙逸仙”。在《孙文学说》一书完成后，他将此书赠送给妻子宋庆龄和岳母倪桂珍。如今，在上海孙中山故居内，仍保存着孙中山的5000余册中外书籍。

孙中山还时常去逛书店。据马湘回忆，有一次他陪孙中山和宋庆龄去上海市棋盘街旧书店购书，选购了许多线装书。马湘用带来的大包袱把书包好，感到太重，光靠手提肩扛拿不回去，便对孙中山说：“可否雇一部马车搬回去呢？”孙中山看了看说：“好，这样重的书籍背着是不好走。”可是他伸手向衣袋一摸，说：“钱已经买书用完了。”宋庆龄也没有带钱，于是他们只好借用马湘仅有的四角钱付了车费。



•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誓约书

一纸誓约 经历生死考验

1915年10月25日，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时，曾委托一位日本朋友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。并用日文写了一份《誓约书》，如今读来，仍然十分感人。

誓约书中文译文如下：

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，并订立以下诸誓约：

- 一、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。
- 二、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，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。
- 三、万一旦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，即使受到法律上、社会上的任何制裁，亦不得有任何异议；而且为保持各自之名声，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，亦不得有任何怨言。

上述诸誓约，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，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。

本誓约书制成三份：誓约者各持一份，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。

誓约人 孙文（章）
同 宋庆龄
见证人 和田瑞（章）
一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

这份《誓约书》一共有三份，孙中山与宋庆龄以及他们的婚姻见证人和田瑞各保存一份。目前仅有一份留存于世。而被孙中山与宋庆龄保存在上海故居内的那两份《誓约书》，在抗战时期不幸丢失。1962年，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份《誓约书》，请宋庆龄鉴别真伪。宋庆龄看到后非常高兴，说这是真品，并解答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关于《誓约书》日期为“26日”而不是“25日”的疑问。她说，因按照日本旧俗双日为吉日，所以他们接受律师的建议，将25日写为26日。

1980年3月18日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带着这份《誓约书》原件来到宋庆龄住宅，请她题字。宋庆龄在卷尾题写了“此系真品”四字，并签名盖章，并附函解释了自己曾用名宋庆琳。如今，这份《誓约书》成为孙中山与宋庆龄爱情的见证。

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共同生活中，也曾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。

1922年6月28至29日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刊发了一篇宋庆龄的回忆文章《总统夫人之粤变纪实》，讲述了在陈炯明发动叛变后她与孙中山所经历的一场生死劫难。这是宋庆龄安全

抵达上海后，《民国日报》派记者前往采访她，“夫人因撰一文，述粤变实情，嘱为发表”。

宋庆龄在自传中回忆了那段令她永生难忘的经历：“六月十五之夜二时，我正在酣梦中，忽被中山先生喊醒，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。他刚得一电话，谓陈军将来攻本宅，须即刻逃入战舰，由舰上可以指挥，剿平叛变。我求他先走，因为同行反而使他不便，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。再三婉求，他始允先行，但是命令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，然后只身逃出。……枪声沉寂之后，我化装为一村姬，而剩下的一卫兵扮作贩夫，离开这村屋。……那夜通宵听见炮声……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，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……第二天，仍旧化装为村姬，……那天晚上，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，真如死别重逢。后来我仍旧化装由香港搭轮到沪。”宋庆龄先行回到上海，而孙中山在永丰舰（后改为中山舰）上坚守了55天后，限于形势也不得不离开广州回到上海。

1922年8月14日，孙中山到达上海的那天，恰逢上海遭受台风的侵袭，宋庆龄和革命同仁冒着大雨前去

码头迎接孙中山。宋庆龄经过此劫，失去了正在妊娠中的孩子，但是“中国可以没有我，不可以没有你”的坚强信念，让她越发坚强。此时，他们夫妇俩经历过革命的生死考验，感情更加深厚。

宋庆龄在给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：“自己仅有的欢乐，只有和孙博士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，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，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。”

1922年秋，在上海家中，孙中山感念妻子对他的付出和深情，特地为她题写“精诚无间同忧乐，笃爱有缘共死生”，并署名“庆龄贤妻鉴 孙文”。

生活节俭 拒收毛皮大衣

孙中山为革命四处筹款，自己却没有多少积蓄。他一生清廉，生活朴素，却还常常接济革命同志。1920年他在上海期间，为了促成粤军回粤，急需用钱，他便将华侨赠与他的莫利爱路29号的房子作抵押，而抵押手续就是由廖仲恺办理的。老同盟会员耿毅回忆说，有一次他到孙中山先生家里去，商谈革命经费的事情。孙先生从床下拉出一只箱子，打开箱盖，里面有一些钱。他对耿说：“鹤生，这些你都拿去吧！”胡汉民在旁边着急地说：“你把这些都给了鹤生，自己怎办呢？”耿毅也知道孙先生经济拮据，便推辞了。孙中山却说：“你们别管我，我总有办法。”后来，陈其美筹到了一笔钱，才解决了此事。

孙中山在吃的方面也不讲究，他在南京当大总统时，总统府负责官员的饮食，一般都是三元以上一餐，而孙中山只花四角钱左右一顿。孙中山在上海居住期间，家



•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见各界欢迎代表

里平日有好几个人用餐，但每天的菜钱不超过两元。他喜欢饭后吃水果，最喜欢吃香蕉和菠萝，最不喜欢吃榴莲。

有一次唐绍仪来访，畅谈至中午，孙中山便留他吃饭，并让马湘去位于北四川路的广东饭馆“趣乐居”买了一只卤水肥鸡。结果唐绍仪很快便把卤水肥鸡吃完了，还以为有其他的菜，便在等着。孙中山见唐绍仪还在等上菜，便对唐绍仪说：“简慢的很，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。”回头对马湘说：“马湘，还有什么菜？”马湘回答道：“厨房只有咸鱼。”后来唐绍仪一边用咸鱼下饭，一边对孙中山说：“我大吃惯了。一只肥烧鹅，我一餐可以食完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，每餐菜钱便要10元啊！”后来，伍廷芳、伍梯云和唐绍仪等几个人一起来面见孙中山，当孙中山留他们吃晚饭时，伍廷芳便说：“我每日喜食花生、甘薯、鸡蛋和一些鲜鱼，不惯食肉，还是让我回家吃饭吧！”大家都知道孙中山在饮食上非常节俭，不想让他破费。

孙中山在穿着上也十分简单。民

国初期，他一身笔挺的西装，非常神气。但在他发起讨袁斗争由日本返沪后，便常穿中山装，有时穿中式衣服。他在天津张家花园的留影中，便是一身蓝袍黑褂。对于他自己设计的“中山装”，他说：“这个样式是我创造的，又大方，又好看，又便宜，穿西装又穿不起，穿这衣服最好。”有一次，上海永安公司经理郭彪派人给孙中山送来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，孙中山惊讶地对马湘说：“上海不算十分冷，回广东更不冷，我又不到北方去，我不收他的，你拿去还给他吧！”马湘便拿着大衣找到郭彪，对他说：“中山先生多谢你，但皮衣先生不需要用，命我送还给你。”郭彪只得收下。过了两日，郭彪去拜访孙中山。孙中山对他说：“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，获利甚巨，希望能够将赚得的资金拿来办工厂、办实业，并希望你们也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资本，回国开办工厂、农场和兴办各种实业。你送给我的皮大衣，我不应收领。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，永安公司是股份生意，也不可拿股东的钱来送礼。如果是

你送的，更不应该。你把这大衣卖给外国人，可以获得厚利。我的衣服足够御寒，更不需穿这样华贵的大衣。我对你的诚意十分感谢。”郭彪听了孙中山的话，十分钦佩，后来他对人说，孙中山先生真是中国一位伟人。

不但如此，孙中山在出行时，也不像上海其他名流那样乘坐汽车，而是坐马车或者黄包车。有一次，一位美国中将请孙中山到他的住所吃晚餐。孙中山雇了一辆马车前往。谁知快要到达时，马车坏了一个车轮，天又下起大雨，他便在雨中步行到这位美国中将家，衣服都湿透了。马湘按了两次门铃，终于有人来了，但只开了一道门缝，向外张望了一下，便又把门关了。马湘从短墙上看到一个外国人站在台阶上向外张望，便用英语对他说：“孙博士来了。”这个外国人才跑下台阶，开门请孙先生进去。进门后，门房问马湘：“孙博士是谁人？”马湘回答说：“孙博士你也不知道么？他就是孙文。”那人惊奇地说道：“原来就是报纸上常常登载的孙文，他为什么不坐汽车来呢？到这里来访问的人没有不坐汽车的，刚才门铃响，因没有听到汽车响声，我还以为是顽童作弄，所以没有开门。”饭后，美国中将提出用汽车送孙中山他们回家。孙中山对他说：“谢谢你，不用汽车了，我还要到离此不远的地方找一位朋友。”这时雨也停止了，孙中山便和马湘步行回家。

寄情翰墨 书赠同志战友

在上海期间，孙中山除了与同仁筹划革命事宜，还常常探讨诗词书法。如今在上海孙中山故居内，还保存着他曾经使用过的砚台和印泥，和他留下的几幅墨宝。

张静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。孙中山在一次赴欧洲的途中，



•孙中山墨宝

在轮船上结识了法国华侨张静江，此时张静江是清政府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，而孙中山则是清廷的通缉对象。张静江却主动对孙中山表示友好。当时他在法国巴黎开了家古董店。他与孙中山约好：“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用钱，可以随时打电报给我，但是碍于当时国外环境，这些事宜秘密进行，你如需要用钱，不用写明数目，只写ABCDE就可以代替一万、二万、三万、四万、五万了。”孙中山对他的话半信半疑。后来当革命需要用钱时，孙中山就让廖仲恺打电报给法国的张静江，结果张静江果然如数汇来钱款，孙中山对他赞叹不已。孙中山在上海期间，张静江写信请孙中山为他题字，孙中山致函表示同意。1922年11月16日，孙中山致张静江的函中称：“靖江兄鉴：属写字一事，待日间再行写过，方能送上。至于贺令郎微物，乃内人心事，彼亲自至肆中采买者，可

向彼道谢也。”他在信中提到的写字一事，便是他后来为张静江题写的对联：“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四十州。”说起这副对联，还有一个故事。

此副对联是孙中山改了唐代诗僧贯休所作的诗。贯休的原诗是“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十四州”。贯休因避黄巢之乱，来到越地，将此诗献给吴越王钱鏐以求晋见。钱鏐一见此诗，大加欣赏，但是嫌“一剑霜寒十四州”一句不够气势，便让贯休改“十四州”为“四十州”，贯休听说后便回头走了，从此杳无音讯。而孙中山却愿为张静江改此诗句，可见张在孙中山心中的分量。孙中山还为张静江题写了“丹心侠骨”四字，称他为“革命圣人”。

在上海期间，孙中山还经常与杨庶堪、谭延闿、于右任等人探讨诗词书法。一次，杨庶堪拿着一幅他收藏的《王右军（王羲之）墨宝神品》请孙中山品评。孙中山对此赞赏不已，特地题写“羲之妙墨”四字。还有一次，杨庶堪特地请孙中山为其手书《礼运·大同篇》，孙中山当即题赠，落款为“沧白兄雅属 孙文”，此卷藏于上海博物馆。孙中山在上海期间留下的墨宝很多，除了他经常为友人题写的“博爱”“天下为公”等，还有为交通大学题写“强国强种”，为上海中华武术会题写匾额“尚武楼”等，为钱化佛题写的“作如是观”“无量佛”，为上海大学《孤星报》题写的“孤星”等。

1924年11月18日，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，又回到了他在法租界的家。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来到上海。不久，他便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溘然长逝。而这段在上海的生活岁月，也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安定和美好的时光。■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